

欧亚历史文化文库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总策划 张余胜

長城時代的開啓

——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

下册



丛书主编 余太山
赵现海 著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

欧亚历史文化文库

总策划 张余胜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明长城时代的开启

——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

下册

丛书主编 余太山
赵现海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明长城时代的开启：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/ 赵现海著. — 兰州 : 兰州大学出版社,
2014. 6

(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/ 余太山主编)
ISBN 978-7-311-04371-1

I. ①明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城—修建—研究—榆林市—明代 IV. ①K928. 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8604号



书 名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

——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(下册)

丛书主编 余太山

作 者 赵现海 著

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
电 话 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
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
电子信箱 press@lzu.edu.cn

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

开 本 700 mm×1000 mm 1/16

总 印 张 40.75 (插页5)

总 字 数 563千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11-04371-1

定 价 122.00元(上、下册)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淘宝网邮购地址：<http://lzup.taobao.com>

目 录

上册

1 导论

——16世纪以来长城形象、

研究之嬗变与本书之主旨 / 1

1.1 绪论 / 1

1.2 明清时代长城地位之升降与
长城史研究之奠基 / 4

1.3 民国时期长城形象正面化与
长城史研究的正式开展 / 10

1.4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地位的
提升与长城史研究的
全面展开 / 21

1.5 16世纪前后西方世界
长城形象之演变、记述与
研究 / 38

1.6 美国社会科学化史学潮流中
长城研究及其反动与调适 / 54

1.7	16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 长城记述与研究 / 80
1.8	“长城社会史”(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)的提出与本书之主旨 / 98
2	明前期“东北边疆时代”特征与 河套“弱点”地位 / 118
2.1	绪论 / 118
2.2	“河套”释义及其在中国古代“核心边疆”的 整体性“过渡阶梯”地位 / 119
2.3	近世时期“东北边疆时代”特征与 河套“弱点”地位 / 131
2.4	明初东胜诸卫建废及其 主要保障河东之定位 / 140
2.5	明前期宁夏河套内层防线与 大同、山西协防河套机制 / 150
2.6	明前期陕北拱卫河套与 其“差缓”地位 / 158
2.7	小结 / 165
3	“内政优先边防”政治文化与 明前期撤离“阴山边疆” / 167
3.1	绪论 / 167

3.2	明初“阴山边疆”军事攻防体系 / 167
3.3	“靖难之役”后阴山边疆两翼剪除与蒙古进攻阴山两侧 / 184
3.4	永乐年间鞑靼威逼阴山边疆与兴和卫内徙 / 192
3.5	仁宣时期边疆收缩政策与开平卫内徙 / 204
3.6	小结 / 218
4	宣德中期以后蒙古打通“阴山走廊”与出入河套 / 221
4.1	绪论 / 221
4.2	宣德、正统之际鞑靼打通阴山走廊与明朝边界意识的兴起 / 222
4.3	正统时期兀良哈进入河套线路及其地理特点 / 232
4.4	“土木之变”后瓦剌、鞑靼进入河套与明朝“搜套”行动的展开 / 244
4.5	天顺年间蒙古草原灾荒与鞑靼孛来、阿罗出出入河套周边 / 253
4.6	小结 / 264

下册

5 陕北地形与明中期延绥镇营堡

纵深防御体系的建立 / 267

5.1 绪论 / 267

5.2 天顺二年延绥镇建立与管辖地域 / 267

5.3 陕北地形特征与正统至天顺时期榆林
营堡寨纵深防御体系的初步构建 / 282

5.4 成化时期榆林边墙修筑以前的
营堡增筑与移动 / 319

5.5 明中期河套营堡防御理念由沿河
筑守至河套南缘的内移 / 342

5.6 小结 / 354

6 成化时期鞑靼驻牧河套与

明朝“搜套”攻势防御 / 358

6.1 绪论 / 358

6.2 成化初年毛里孩驻牧河套与
明中期杨氏家族之衰落 / 359

6.3 明中期石氏家族兴亡与
杨信充任“搜套”总兵官 / 372

6.4	成化二年杨信搜剿毛里孩、阿罗出持重无功与军事系统人事变革 / 380
6.5	成化六年朱永搜剿阿罗出部分成功与“搜套”军队文官系统崛起 / 393
6.6	成化七年癿加思兰等部进入河套与“搜套”军队文武系统地位嬗代 / 403
6.7	小结 / 412
7	明中期西北财政危机与移民河套可行性考察 / 415
7.1	绪论 / 415
7.2	西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匮乏财政状况 / 416
7.3	“搜套”导致西北社会动荡不安与户部反对立场 / 431
7.4	中国古代河套生态环境变迁与成化时期移民河套之不可行 / 445
7.5	小结 / 460
8	西北巡抚系统政治利益与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构建 / 463

8.1	绪论 / 463
8.2	延绥镇巡抚设立、政治利益与成化七年 户部系统余子俊任职 / 464
8.3	成化时期西北巡抚反对“搜套”立场与其 提出的 3 种边墙方案 / 472
8.4	政治舆论支持边墙方案与余子俊构建 榆林边墙前沿防御体系 / 480
8.5	余子俊修筑、迁移营堡与榆林明长城 立体防御体系的形成 / 491
8.6	成化中期以后延绥镇城堡增筑与 榆林明长城立体防御体系的完善 / 505
8.7	余子俊拓定延绥镇北界与 后世“弃地守墙”之误解 / 519
8.8	榆林明长城的示范意义与明中后期 “明长城时代”的开启 / 530
8.9	小结 / 542
9	结论 / 547
	参考文献 / 566
	索引 / 588
	后记 / 620

5 陕北地形与明中期延绥镇营堡 纵深防御体系的建立

5.1 绪论

明中期蒙古各部穿过阴山走廊，进入河套之后，重点进攻的地区便是位于河套南面，正面阻截河套的内核心边疆榆林地区，这一地区由明前期俨然内地一转为边疆争战之地，呈现了“边疆化”历史趋势。为应对这一地缘形势变化，明朝逐渐提高榆林军队防御规格，最终于天顺二年建立独立的延绥镇。与此同时，明朝开始将北部边疆流行之营堡防御体系引入榆林地区，逐渐构建了具有广阔纵深的内核心边疆营堡防御体系，促使陕北地区社会面貌发生巨大改变，呈现“军事化”历史趋势。本书对明中期在蒙古各部冲击之下，在榆林地区建立军镇，修筑营堡、城寨的制度建设进行考察，并结合陕北地理特征，对军镇、营堡、城寨选址标准进行归纳分析，最后借鉴军事学中的“纵深防御”(defense-in-depth)概念，对延绥镇营堡纵深防御体系的战略特点予以揭示，从而在陕北地理背景之下，全面勾勒出明中期在这一地区的最初制度框架、政治立意与社会影响。

5.2 天顺二年延绥镇建立与管辖地域

仁宗时，明朝即转向收缩边疆政策，开始提升本处内层防线之陕北地区防御级别。“升锦衣卫指挥金事林观、刘俨俱为陕西都司都指挥

金事，观掌绥德卫，俨掌延安卫。”^[1]宣德时期亦是如此。“升绥德卫指揮使王永为陕西都指挥佥事，仍于延安、绥德巡督守备。”^[2]虽然大同镇、山西军队兼管黄河西岸，但陕北军队同样亦曾在河东活动。正统元年八月，明朝敕宁夏总兵官史昭称：“延安都指挥王永欲往河曲焚草搜贼，已允所请。”^[3]河曲便处河东之地，属大同、山西军队辖地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央斥责之下，陕北、山西开始共同协防黄河地带。宣德年间，陕北军队亦开始得到火器。^[4]

英宗即位后，鉴于榆林东北开始频繁遭到兀良哈之进攻，遂逐步提高陕北武将级别，从都司官衔上升至都督官衔，^[5]并陆续增强陕北军队实力。不仅发还京操班军，^[6]而且开始从陕西都司调遣班军。^[7]伴随防御规格日渐提升、防御体系日渐完备，陕北军队遂从陕西都司中逐

[1] [明]杨士奇等：《明仁宗实录》卷1下“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甲子”条，第30页。

[2] [明]杨士奇等：《明宣宗实录》卷109“宣德九年三月庚寅”条，第2447页。

[3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1“正统元年八月甲子朔”条，第403页。

[4] “给延安绥德官军手把铳六百，信炮六百四十及铳箭火药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4“正统元年十一月丙辰”条，第486页。

[5] “命镇守延安、绥德都指挥佥事王永回陕西都司署事，敕都指挥同知王祯代永镇守”，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34“正统二年九月癸丑”条，第669—670页；“辛亥，升镇守延安等处都指挥同知王祯为都指挥使，绥德卫指挥使吴信为都指挥佥事，指挥佥事胡原为指挥同知，以获虏寇功也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38“正统三年春正月辛亥”条，第744—745页；“升镇守延安、绥德等处都指挥使王祯为右军都督佥事，以黑木沟获虏功也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76“正统六年二月乙亥”条，第1487页；“升镇守延安、绥德都指挥佥事王祯为都督佥事，仍旧镇守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21“正统九年九月丁亥”条，第2436页；“召镇守延安、绥德都督王祯还京，敕都督佥事杨信代祯镇守，张钦副之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76“天顺元年三月乙亥”条，第5877页；“敕镇守延绥等处都督同知王祯等曰……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88“景泰元年闰正月戊午”条，第3835页；“升镇守延绥等处都督同知王祯为右都督……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01“景泰二年二月庚午朔”条，第4271页。

[6] “发遣陕西边卫官军操备京师者各还原卫。先是，上谕行在兵部尚书王骥曰：‘陕西官军在京操备者，兹欲发回，以防胡寇，卿可与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计议可否以闻。’至是，骥会辅等议陕西西北俱临边境，而绥德、延安、庆阳、平凉、秦州五卫尤切近，宜即遣还，各守分地。其腹里卫分，仍旧更番赴京操备。故有是命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“宣德十年春正月壬寅”条，第36页。

[7] “备御榆林庄陕西都指挥王永等奏累年黄河冻消，将西安等卫发来备冬官军放回。今闻达贼在河套，逼近府谷等处。恐探知无备，窃来犯边，乞暂留守哨。从之。”参见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8“正统二年三月癸巳”条，第555页。

渐分立出来，而成为独立防区。主将亦不再受陕西其他军镇武将之节制，称“镇守延绥”，^[1]不过仍受陕西文官系统节制。景泰元年（1450），

镇守延绥等处都督同知王春奏：“达贼入寇，臣等预令极边人民移入腹里，镇守陕西都御史王文、宁夏参贊军务佥都御史韩福等乃移文禁止，以致达贼将山城、清平二驿，巴门、摆铺百户所人畜抢杀，宜治文等失机误事之罪。”^[2]

榆林庄也已专门命将驻守。“升绥德卫指挥佥事许英为署都指挥佥事，哨守榆林庄。镇守都御史陈镒奏英晓边事善战斗，为众所服，故有是命。”^[3]此外，榆林庄还修筑城池。“修陕西榆林庄塞城。”^[4]“戊子，镇守延安等处都督佥事王祯奏：榆林庄城垣原以沙土修筑，天雨颓塌。请俟明年春扣发军余，择土坚筑。从之。”^[5]明人有榆林周边十八寨之说。“我高皇帝再造区夏，尽复秦汉之故境，河南地皆我中国有。时议者不能因河为塞，乃就近地设榆林庄等十八寨，屯兵戍之。”^[6]

“土木之变”对明朝北疆的冲击甚大，甚至陕北南部亦开始修筑城堡，以坚壁清野。由于蒙古绝大多数的进攻，基本限于物资、人口之掠掠，而非取代明朝政权之举动，因此坚壁清野是明朝减少边民损失的直接手段，也是克制蒙古战略的有效方式，以至于有“筹边莫尚坚壁清野”之说法。^[7]景泰元年，“丙午，陕西合水县丞潘敬言：本县去边三百余里，部民多在迤北，随田以居。遇贼辄惊走，不能生理。本县旧有土城，臣欲修筑，置立垛口、门栅，冬寒河冰之时，即徙近边，丁夫入城，选民壮千人持兵以守。至春暖河开，仍令耕种。从之。”^[8]“命修筑陕西

[1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37“正统二年十二月乙亥”条，第718页。

[2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88“景泰元年闰正月庚申”条，第3838页。

[3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43“正统三年六月己未”条，第832页。

[4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83“正统六年九月己未”条，第1665页。

[5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47“正统十一年十一月戊子”条，第2898—2899页。

[6] [清]谭吉璁：《延绥镇志》（康熙）卷6—3《巡抚延绥都察院题名记》（姚镆），第542页。

[7] [明]黄景昉著，陈士楷、熊德基点校：《国史唯疑》卷12《补遗》，第362页。

[8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90“景泰元年三月丙午”条，第3898页。

宁州、真宁、合水、安塞、鄜州等处土城。”^[1]

天顺年间，李来部落开始更长时间地居留河套之中，并以此为基地，不断进攻河套周边地带，尤其陕北地区。相对于其他地区，榆林之所以成为李来进攻的重点地区，在于榆林的位置、地形与布防。从位置而言，榆林地处河套正南部，直接面对李来南下之势；从地形而言，榆林与河套交界地区属风沙区，地势较为平坦，利于蒙古骑兵作战。从布防来看，榆林是明前期军事防御最为薄弱的地区。成化时期陕西巡抚马文升称：“陕西三边，榆林最为要害。盖甘凉可以坚壁清野，而坐困虏寇。宁夏可以恃山沮河，而守御叛羌。惟榆林河套山泽之利，足以资虏人马之用，又兼入境抄掠，常获厚利，是以侵犯我边，曾无虚岁。”^[2]

天顺二年（1458），蒙古进攻榆林，延绥守将遂充总兵官。“虏酋李来寇延绥。守将都督佥事张钦连战败之，进都督同知，命佩征虏副将军印，总延绥、庆阳诸路兵。”^[3]不过此时张钦尚属作战总兵官，并非镇守总兵官。天顺二年，“乙巳，封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，命充总兵官，佩征虏副将军印，镇守延绥等处地方。”^[4]延绥镇遂正式建立，^[5]镇址在

[1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190“景泰元年三月辛亥”条，第3902页。

[2] [明]刘吉等：《明宪宗实录》卷79“成化六年五月癸巳”条，第1540—1541页。

[3] [明]陈建撰，[明]岳元声订：《皇明资治通纪》卷18《戊寅天顺二年》，收入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，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407—408页。

[4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87“天顺二年二月乙巳”条，第6150—6151页。《陕西通志》（嘉靖）、《陕西通志》（康熙）皆以王祯为延绥镇总兵官之始，其实王祯一直未充总兵官。参见[明]赵廷瑞修，[明]马理纂《陕西通志》（嘉靖）卷19《人物六·榆林总兵》，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摄制，1992年。

[5] 艾冲认为延绥镇实际形成于正统二年，镇守总兵官则定设于天顺二年，参见艾冲：《明代陕西四镇长城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页；胡凡认为延绥镇的形成是在正统元年至十年之间，它的形成和王永、王祯有直接关系，而以王祯更为重要，参见胡凡：《论明代九边延绥镇之形成》，载《中国史研究》2008年第2期；于默颖认为延绥设镇不晚于永乐，至正统初王祯镇守其地，以及修筑边防公事，应视为延绥称镇的标志，参见于默颖：《明蒙关系研究——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》，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4年，第103—104页；范中义认为延绥镇初设于景泰元年，天顺二年设置镇守总兵官，参见范中义：《明代九边形成的时间》，载《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1995年第4期；韦占彬认为延绥镇建于天顺二年，参见韦占彬：《明代“九边”设置时间辨析》，载《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》2002年第3期；田村实造认为榆林总兵官设置于成化九年，参见[日]田村实造《明代の北邊防衛體制》，载《明代滿蒙史研究——明代滿蒙史料研究篇》，京都大學文學部（京都）1963年版，第102页。

绥德卫。帅府亦于这一时期修建。“帅府。中城鼓楼西，天顺中置。”^[1]伴随着延绥镇的建立，榆林地区从而脱离陕西都司、宁夏镇管辖，成为独立的军事防区，陕北地区边疆化历史进程正式完成。绥德镇之所以以绥德卫作为镇治驻地，大体有三方面的因素：首先，绥德卫地处榆林南部丘陵、低山分布之地，南依延安卫军事烘托，体现出“依险”特点，这是延绥镇设治于绥德卫的军事因素。其次，绥德卫地处无定河下游，控制陕北河谷主干通道，防止河套蒙古沿无定河南下，进入黄河中游两侧的西北内地，体现出“扼要”特点，这是明朝最初置镇于绥德的交通因素。最后，绥德卫在经济上还借助陕北屯田中心延安卫之便利，体现出“就粮”特点，这是延绥镇设治于绥德卫的经济因素。

延绥镇总兵官佩印屡有变化。《明英宗实录》载，天顺四年，继任之张钦改佩靖虏副将军印。“甲寅，命延安、绥德等处左参将都督同知张钦佩靖虏副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同左少监田萬镇守地方。”^[2]据《明孝宗实录·房骥传》记载，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房骥已改佩靖虏将军印。“弘治十一年，升右府署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，挂靖虏将军印，镇守延绥，未拜命卒。特赐葬祭。”^[3]但当时记载却未及佩印之事，故此为孤证。“命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庄鑒镇守宣府，福建都指挥佥事房骥升

[1] [明]郑汝璧等修，[明]刘余泽等纂，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：《延绥镇志》（万历）卷1《舆图·延绥镇图说》，第107页。

[2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32“天顺四月闰十一月甲寅”条，第6679页。但据《明宪宗实录·张钦传》的记载，天顺三年，延绥总兵官已改靖虏将军印。“天顺己卯，佩靖虏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仍守延绥。”参见[明]刘吉等：《明宪宗实录》卷141“成化十一年五月己巳”条，第2631页。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，《明英宗实录》所载更为原始，史料性更强，而《张钦传》却为后人之追溯与创作，故以《明英宗实录》之记载为准。据《明孝宗实录·鲁鉴传》的记载，成化年间鲁鉴已改佩靖虏将军印。“协同镇守甘肃左副总兵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鲁鉴卒。鉴，西宁人，袭其父失加指挥同知职，以功累升至都督同知。初守备红城子，既而充右参将分守庄浪，添守西宁，复充左副总兵，协守甘肃，挂靖虏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镇守延绥等处，赐诰，加荣禄大夫。后以疾致仕。”参见[明]李东阳等：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85“弘治十五年三月乙酉”条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台北）1962年校勘本，第3409页。但《明宪宗实录》仍载为靖虏副将军。成化二十二年，“甘肃左副总兵署都督同知鲁鉴佩靖虏副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”参见[明]刘吉等：《明宪宗实录》卷275“成化二十二年二月乙巳”条，第4641页。同理，亦依据《明宪宗实录》之记载。

[3] [明]李东阳等：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44“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己丑”条，第2521页。

署都督金事，镇守延绥；陕西都指挥同知郭鏞升署都督金事，镇守宁夏。”^[1]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，陈瑛改佩征西将军印。“罢镇守延绥署都督金事熊冈，命镇守陕西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陈瑛佩征西将军印往代之。”^[2]据《明武宗实录》载，正德四年（1509）始添铸靖虏将军印与延绥总兵官。^[3]这项记载称添铸却有不妥，原因在于天顺二年，已铸靖虏将军印。“造平虏将军、平虏副将军、靖虏将军、靖虏副将军、平胡将军、平胡副将军、平狄将军、平狄副将军印各一。”^[4]从上条记载中可以看出，正德四年以前，延绥总兵官改佩镇西将军印。而吴江大致在正德四年四月继任延绥镇总兵，但却未见佩印记载，故上条记载亦为孤证。^[5]

但《大明会典》（万历）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明史·职官志》却皆载延绥镇总兵官军号为“镇西将军”。^[6]《明史》且称洪熙元年（1425）制颁。^[7]但洪熙时期，延绥尚未建镇，相应亦未有总兵佩印的情况。尽管“镇朔将军印”在洪武时期已有，^[8]但并未见具体记载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的记载基本来源于《菽园杂记》，只是将“靖虏副将军”改为“镇

[1] [明]李东阳等：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43“弘治十一年十一月癸巳朔”条，第2471页。

[2] [明]李东阳等：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48“弘治十二年三月乙酉”条，第2614页。据《明武宗实录·张安传》载，弘治年间张安已改佩镇西将军印。“都督金事张安卒。安在成化间，以指挥同知从征神木，升指挥使。弘治初，充大同游击将军，又充副总兵，协守宁夏，升左府署都督金事，寻实授，佩镇西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在镇尝以战功，玺书褒美。正德间，仍佩印，移镇大同。寻乞休卒，赠荣禄大夫。”参见[明]费宏等：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26“正德十年六月乙酉”条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台北）1962年校勘本，第2533页。而《明孝宗实录》却载为弘治十三年挂征西将军印。“升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张安为署都督金事，挂征西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”参见[明]李东阳等：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62“弘治十三年五月己未”条，第2914页。同理，以《明孝宗实录》为准。

[3] [明]费宏等：《明武宗实录》卷53“正德四年八月癸亥”条，第1203—1204页。

[4] [明]陈文等：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97“天顺二年十一月庚子”条，第6319页。

[5] [明]费宏等：《明武宗实录》卷49“正德四年夏四月己卯”条，第1118页。

[6] [明]申时行登修，赵用贤登纂：《大明会典》（万历）卷126《镇戍一·将领上·延绥》，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影印明万历内府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84页；[明]王圻：《续文献通考》卷95《职官考·将军》，第5709页。

[7] [清]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76《职官志五·总兵官》，第1866页。

[8] [明]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2《列朝·符印之式》，收入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59页。

西将军”，应继承了《大明会典》(万历)的记载。^[1]《明史·吴江传》便将吴江所佩印改为征西将军印。“乃进雄署都督同知，以延绥总兵官吴江所佩征西将军印佩之，而别铸靖虏将军印予江。”^[2]可见，《明史》因非一人所修，故出现歧义记载。正德四年(1509)，延绥镇总兵官改佩靖虏将军印后，仍偶有改佩镇西将军印者。“起原任总兵萧如熏挂镇西将军印，镇守延绥。”^[3]“升江西按察使陈仪、广东按察使萧应坤为广西左、右布政使，吴自勉为镇西将军，总兵官，镇守延绥等处地方。”^[4]

成化八年(1472)，延绥镇治向北迁至榆林卫。嘉靖时期成书之《继世纪闻》载：“盖自成化八年间设榆林镇，巡抚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砦，陕西民供馈不继，奏送江南折粮银，以补不足。”^[5]《延绥镇志》(万历)载：“成化七年，都御史王锐建置榆林卫。八年，都御史余子俊于旧城北增筑城垣，置榆林卫指挥使司，隶陕西都司。”^[6]《延绥镇志》(康熙)亦载：“至成化七年，巡抚王公锐奏立榆林卫。八年，余肃敏代锐，始迁绥德镇于榆林。”^[7]《国榷》记载了余子俊迁镇榆林，劳役军民甚重。

薛应旂曰：“尝视师延绥，其故老咸曰：‘镇城旧在绥德，余公迁出榆林，军民役死，不下万计，穷簷荒废，千里巨墟，孤儿寡妇，衰麻扶杖，日哭于军门，而浮沙筑墙，终难就绪。向使移镇河湟，逼逐套虏，兴此大役，犹可言也，顾仅仅止此。今榆林孤城，悬于荒漠，

[1] [明]陆容撰，佚之点校：《菽园杂记》卷9，收入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08页。[清]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68《舆服志四·百官印信》，第1662—1663页。

[2] [清]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175《曹雄传》，第4664—4665页。

[3] [明]叶向高等：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80“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壬子”条，第11024页。

[4] [明]汪楫辑：《崇祯长编》卷9“崇祯元年五月壬戌”条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台北)1962年校勘本，第461页。

[5] [明]陈洪谟：《继世纪闻》卷2，收入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83页。

[6] [明]郑汝璧等修，[明]刘余泽等纂，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：《延绥镇志》(万历)卷1《建置沿革》，第27页。

[7] [清]谭吉璁：《延绥镇志》(康熙)卷6—2《艺文志·榆问》(张珩)，第539页。不过《九边图论》却载为成化九年。“成化九年，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徙镇榆林堡。襟吭既据，内地遂安。”参见[明]许论：《九边图论·榆林》。

劳师戍守，岁费万千。绥德藩篱，竟失锁钥，虏骑长驱，直闯内地，其贻谋不审矣。”由此观之，则宣、大之役，台省交章，非无自也。”谈迁曰：“余肃敏饬边修备，可谓国之能臣，当时阻格，不过狃偏安、怵大役耳。易世而后，犹有遗议，如薛仲常者，虽非通论，不可不存其说。”^[1]

榆林卫之设置，源于成化时期榆林地区不断遭受长期驻牧河套的鞑靼部落的进攻。成化六年（1465）三月，延绥镇巡抚王锐曾有设置五卫之建议。“延绥榆林城，镇羌、安边二营堡，俱系要地，城堡草创，军马单弱，难以御贼。宜于榆林城添设三卫，于镇羌、安边二营各设一卫，增兵防守。”^[2]五月，陕西镇守武将白玉亦请求设置三卫。“延绥边方东西绵亘二千余里，通接察罕脑儿、断头山诸处，最为要害。诸营堡防守官兵，俱于陕西南阳、潼关摘调，每岁分番往来无常，恐非经久之计。切见榆林城、安边营、神木县系边境要冲，土地广饶，水草便利。宜于其地各立一卫，或分调延绥、庆阳三卫官军，或编送内外问拟刑徒，及近岁清出诸卫新军，守御其地。”^[3]但最终仅设置榆林一卫。

明朝之所以迁移延绥镇治，在于榆林南北地形之差异。榆林由北至南，地形大体可分3类，明长城以北为风沙区，中部为丘陵沟壑区，西南部白于山区一带无定河、大理河、延河、洛河发源地为梁状低山丘陵区。因此，榆林地形愈往南愈险要，这也是明朝在延安、绥德依险设防之地理原因。而愈往北，榆林地形愈加平坦而无险，相应不便于防守，这也是明前期在河套南缘广大地区，除府谷、神木稍有兵力外，其他地区并无机构设置之地理因素。明前期蒙古尚未进入河套，榆林较少临敌，绥德卫借助当地相对较好的生态条件，发展军屯的同时，依托南部延安卫，对整个榆林甚至河套形成拱卫之势。明中期榆林屡受蒙古进攻，绥德卫之于榆林便骤显鞭长莫及之感。“榆林旧治绥德，而弃米脂、鱼河等处于外，几三百里。虏轻骑入掠，镇兵出御之每不及，而返虏

[1] [清]谈迁：《国榷》卷40《宪宗成化二十二年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2517—2518页。

[2] [明]刘吉等：《明宪宗实录》卷77“成化六年三月辛卯”条，第1491页。

[3] [明]刘吉等：《明宪宗实录》卷79“成化六年五月甲申”条，第1531页。